

一个编辑的书评——

曲士语为

徐宗文

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徐宗文

著

曲士语为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GROUP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曲士语道 / 徐宗文著. —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
2008.9

ISBN 978-7-5343-8607-7

I. 曲… II. 徐… III. 书评—选集 IV. 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51669号

- 书 名 曲士语道
作 者 徐宗文
责任编辑 张胜勇 潘守华
责任监制 吴葆勤 吴 群 徐 玲
装帧设计 张金凤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教育出版社(南京市马家街31号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
厂 址 南京市傅厚岗5号(邮编210008)
电 话 025-57713889, 57711569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13.875
插 页 6
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
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43-8607-7
定 价 35.00元
批发电话 025-83260760, 83260768
邮购电话 025-85400774, 8008289797
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
E-mail jsep@vip.163.com
盗版举报 025-8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谨将此书——

献给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广大作者和读者

献给学术界书评界的广大学人和同人

序

伍杰

来自金陵童翠萍女士的电话，坚嘱为徐宗文先生的大作《曲士语道》写序，我欣然从命。

我认真阅读了《曲士语道》的内篇、自序、跋，翻阅了外篇、杂篇，对内容有所了解，才知道这是一本难得的书评集。徐先生自己说：“非古勿视，非梧桐不栖。”看来他只看重他所爱好的古籍。这反映了他写书评的心态和特色。给我的初步印象是：《语道》的内容丰富，既宽泛又集中，重点是评古籍，评学术专著，诗词、歌赋、戏曲、小说，无所不有；书评的语言犀利，文字流畅，思想独到，运笔还深刻，富于学术色彩，可以说本身就是一本学术专著。

徐先生自谦为“曲士”，我认为他不是庄子在《秋水》篇里讲的“曲士”，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，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。默默耕耘了三十多个春秋，将一生最美的年华，奉献给编辑事业，编辑了许多学术分量很重的优质书，获得了多次国家级大奖，也编辑了许多很实用、影响广泛的书。他取得了重要的成果，无愧于“家”。说编辑

是杂家,那是旧说,从褒义讲是他必须什么都懂,从贬义说则是他什么都不专、不深,庞杂而已。时代不同了,科学在发展。现在不少高校都开设了编辑专业,培养编辑专门人才,也有全面培养出版人才的学院。编辑这一行,已登入我国高等学府的殿堂,在这座殿堂里,有它的位置。编辑已是一门专门学科,编辑有理论,有专业,有悠久的历史,有很深的学问,编辑是专门家。编审、研究员、教授同等重要,仅是学科各异,分工不同。只要有成就,在学术上是平等的。

徐先生说:“编辑原来是书生。”那么,他就是一位书生了。我想,这也对。他当了一生一世的编辑,而编辑总是和书稿、书籍为伍,共生存,为书而生,说是书生,当然也可以。他因为是书生,所以,对书有深厚的感情,有真切的了解,很有体悟。这才写出了许多很好的书评,结集成《曲士语道》。他用“语道”二字来概括他的书评集,也还是有道理的。把他自己的书评称之为“语”,将被评之书言之为“道”。虽为“曲士”,但能“语道”,也算是一种很有水平的专门学问,这不是很有意境,也很有分量么!

徐先生在书名的副标题上,标明是《一个编辑的书评》,跋的题目是《书评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》。可见,他十分重视书评,且总是将书评和编辑紧密联系在一起,他不愧是一位挚爱书评的编辑家。他的跋比较长,有感而发,针对性也很强,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写的。他分析了当前书评的现状,论述了书评的性质,书评的任务和作用,书评的写作原则,书评如何才能健康发展等等,

讲得比较全面、系统。跋是一篇难得的书评理论文章。

徐先生从大量的书评实践——“曲士语道”中，提炼和形成了自己的书评理念，这些书评理念又深化、延伸和促进了他的书评实践，相互作用，相互促进发展。《语道》尽管书评的面比较宽，但有一个主体框架。以古典文学为主，包括两千年里各个时代很有特点、很有成就的文学门类，先秦辞赋、两汉赋文、魏晋诗文、唐诗宋词、明清戏曲、历史散文等等，他都进行评论，评各类专著约40种。本书虽是评各类专著的独立成篇的文章，但统观全局，联为一体，实际上无形中就形成了一部研究古典文学的书评史，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专著。

徐先生说，书评“不是原作的重复”，“应该跳脱原作，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，充分展示个性特点”。本书的可贵在于“来自原作”，又“跳脱原作”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，富于个性，具有鲜明的述评特色。所谓“述”，是概括叙述原书的精髓；所谓评，是以点睛之笔，评原书之未评。对原书加以梳理提炼，又跳出原书作高端评论，这体现出了徐先生自己的书评特色。

这里，我们不妨看看徐先生的实践。他对先秦两汉的辞赋写了两篇书评。一篇是评曹虹的《中国辞赋源流综论》，一篇是评毕万忱等编的《中国历代赋选》“先秦两汉卷”。这两篇评论概括了中国辞赋的起源，辞赋的发展进程，发展中形成的诸多特点，“文选学”的出现和它的成就。徐先生的概括，虽来自原著，但他提出了许多有特色的新见解。如《综论》中讲了明代董越的《朝鲜赋》，讲到

中国辞赋对朝鲜辞赋的影响,辞赋在外交关系中的作用。徐先生认为这些史料和意见很有新意,有开拓性意义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又如对汉赋的起源,《汉书》中说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,历史上将此论看作赋的定义,曹著认为这一命题是误解。这里的“赋”是指“用诗的方式,非关文体”,徐先生认为曹著这一意见是对的,起到了“正本清源的作用”。又如《赋选》中关于枚乘《七发》的主旨,历来有几种说法,有刘勰的“戒膏粱之子”,李善的谏梁孝王,晁补之谏吴王等等。作者否定了这些说法,并肯定如果将《七发》的内容只与某一人物、某一历史事件联系起来,他会将艺术典型简单化。徐先生认为:这不仅涉及《七发》的主旨,而且涉及广阔的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;不能将古典文学研究庸俗化、机械化,要实事求是、科学严谨,这是《赋选》的重要特色。还有宋玉《神女赋》的主题思想,历来有多种解读。《赋选》者一反旧说,认为主题“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”,不能归之恋情和淫说。徐先生认为选者深入研究,“依据翔实资料而提出……能言之成理”,“是一个全新的观点”,支持和肯定了新论。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徐先生评论这些问题,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。

徐先生对《中国中古诗歌史》也评得不同凡响,既有宏观评论,更有点的深入独特论述。全文9 000言,按说,已是不短,而他犹觉意犹未尽,后来又为此书写了一篇《美学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结合》,3 000多字。两篇书评,近13 000言,可谓舒拳展袖,畅所欲言了。同一人评

同一种书,着重点全不相同,评得各有新意,可见评者用心之深。前一篇,从方法论入手,款款道来;后一篇,从美学起笔,娓娓细述。徐先生深入原书,认真品评,概括原书,精心提炼,又跳出原著。他说:此书跳出了其他古籍研究著作平铺直叙的套路,独自创新,将史和论紧密结合,加强了文学史著述的深度;同时论述中加强整体性原则,层层深入,使全书成为完整的独特体系;全书很注重逻辑,将逻辑结构引入文学史的写作,将粗的链条与细的流动相互补充,发掘了中古文学进程的内在逻辑。他认为王钟陵在学术上提出和采用的研究方法,开辟的学术路径,都将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。这些观点,都是很有价值的新论。在后一篇书评中,他抛开方法论,专讲《中国中古诗歌史》的美学价值。将美学与中国文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。分析原著中审美情趣从“丽”向“秀”的转变,审美理想从“真美”向“隐秀”的演化,并举出许多名诗、名句来剖析这一演化过程,形象地说明在文学中美学从汉代向晋唐发展的轨迹。徐先生最终归结为:《中国中古诗歌史》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民族审美心理的变迁,这是骨骼;以作家、作品分析探究了民族审美心理的具体结构,这是血肉。两者相辅相成,这是美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有机结合,也是此书最大的学术特点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两篇评论融为一体,充分表现了徐先生书评思想的活跃和思路的开阔。应该说这是两篇贯通一气、连成一体的好书评。

徐先生还评了《陶渊明和他的诗赋》、《全唐诗人名

考》、《宋代美学史》、《唐宋词美学》、《明代诗文的演变》、《中国戏曲史论》等，他对从先秦到明清代表每一时代的主体文学著作，都进行了评论，我不再一一分析，只觉得他有足够的研究深度，有难得的见解，这是十分可贵的。

我还想说几句，徐先生在书评里，并非只对原著说好话。他比较坦诚，由于他的认真和他的学识，他总是能从他所评的著作中找出不足，严肃地向作者提出。他曾自嘲自己“大约属于那种‘刺猬型’的学者”。我借用“刺猬”一词表述说，现在这样的“刺猬”太少了，应该大力鼓励赞扬这种敢说真话的“刺猬型”的优秀学者。

2008.7.13

序

吴小平

前几天，宗文把一大摞书稿抱到我面前，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请您践约吧。”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他又反问我：“怎么，您忘了？去年秋天您答应给我写序的嘛。”噢，原来如此！我们去年一起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，他曾说将有一部自己的书评集要出版，届时恳请我作一篇序言以示勉励。出于多年老朋友的交情，我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答应了。现在，他果然来讨债了，我当然不能食言。

我和宗文的交往已经二十多年。在这期间，我们不仅是同行和同事，常常在一起畅谈工作，而且还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，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。因此，我们其实更是老友，甚至是知己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宗文一贯老老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做工作、做学问。早几年，他就有一部古代文学的论文集《三余论草》出版，还获得学术界的好评，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，这在只能坚持业余研究的出版人当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同行们每每引以为谈资。

现在,他又有一部新著出版,而且是一部内容集中的书评集,为他多年来担任责任编辑时日积月累写成的,反映的是他长期辛勤劳动的收获。我把集中的文章仔细翻阅了一下,至少让我觉得有这样一些话非说不可:

一、宗文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职业使命感。作为一名编辑,编书是本职工作,也是第一要务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是,编辑是否只要编好书就算完全尽到责任了呢?我看不一定。其实,编辑好书不是根本目的,根本目的是编了好书还要让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播到读者手中,让好书发挥出最大效益来;而宣传图书,包括写好书评,则是发挥好书效益的有效途径,也是一个称职的编辑的本职工作。宗文则把这样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一种使命。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,他才能几十年如一日,一边编辑好书(经他策划和责编的图书获得多个国家级奖励就是证明),一边写作书评予以宣传。我发现,集中所收四十来篇文章,百分之七十以上评论的是他自己责编的书稿,换句话说,是他所在出版社的出版物。这说明什么?说明他的心之所系,全在自己的职业和自己的单位。倘若没有一份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,谁能做到这个份上呢?

二、宗文是一个有心人,是在读书和写作方面愿意钻研、肯花功夫的人。我读了他的书评集中的若干篇文章,感到大多是花力气写成的,有一定的学术质量,不同于一般的泛泛而评,更不是那种为了宣传而宣传的鼓吹式评论。比如他的《评王钟陵著〈中国中古诗歌史〉》,就“兼谈文学史著作编写方法论问题”;《平理若衡 照辞如

编辑。现在,我们的一些编辑,包括有些具有高级职称和高等学位的人,常年为事务所累,甚至还沾沾自喜乐此不疲,不能挤时间读书,不愿花功夫编书,也写不出文章,更不用说著书立说了,这是断断乎要不得的。长此以往,他们还能不能适应不断变化了的形势需要,还能不能永久胜任编辑工作,这是很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情。

由此我还想起所谓的学者型编辑与策划型编辑之争,曾经争论得很激烈。论者各执一辞,辞均有据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现在细想想,谁都有理,谁也没有错。关键在于,时代不同了,要求不一样。计划经济体制下,要求编辑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专业水平,业有所精,学有所成;而在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,出版社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,策划型编辑的要求便应运而生。二者都是时代的产物,无可厚非。但二者又不能有所偏执,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编辑不需要策划意识,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无需多少专业背景,那就不对了。应该看到,当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很多甚具价值传之久远的名著名作,都是我们的编辑策划出来的;市场经济背景下很多优秀的策划人,都是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专业技能的。所以,对今天的编辑的要求,我觉得应该这样提倡:类于专业型、学者型的编辑,应该不断地增强市场意识、策划意识,以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图书产品;而有志于成为策划编辑的同行,则应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、专业水平的提高和专业技能的培养,否则,真的很难策划出有价值有市场的好书来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身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伟大时代，我们在困惑着摸索着向前迈进的同时，身后也留下一串深沉而凝重的脚印。不能简单地说是成功的抑或是不成功的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印记，它们见证了那个伟大的时代。积月累年，蓦然回首，发现那些脚印已然依稀，但我敢说，宗文的这部书评集是一个不易磨蚀的脚印，宗文是那个时代具有鲜明策划意识的学者型编辑，一名值得后来者尊敬和学习的优秀编辑。

宗文的书评集取名《曲士语道》，是借用了《庄子》里面的说法；他把书评集分成内、外、杂篇，也是模仿的《庄子》的编法，看来他对庄子是一个情有独钟的人。我对庄子的理解，其最基本的思想是顺其自然，而又不为外物所累，从而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。宗文有没有进入这样一种境界？我看，既有也没有，至少他在“立言”方面还是有所期求的，不然他何以老是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？我知道，他是一个“杂家”，一个多面手，不仅研究学问、写作书评，还喜欢搞点文学创作，这在我们系统中是比较少见的。据说，他的散文也将结集出版。我们一方面都在等待着读到他的华章，同时作为朋友，我也希望他能顺其自然，活得更轻松随意一点。

我是从来不敢写序言一类文字的。与宗文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就试这一次吧。

2008年夏月

编辑原来是书生

(代自序)

我自1977年初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，至今已经三十余年。三十年，古人谓之“一世”。唐人有诗曰：“人生大限虽百岁，就中三十称一世。”一世，也就是一生、一辈子。可以说，我的一生一世的事业就是编辑工作。一个人毕生所从事的一种工作，其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如何？这是每一个过来之人都不言而喻的。

然而，做了一辈子编辑工作，我现在却要提出一个有点近乎荒唐的问题：编辑（主要指出版社的图书编辑），其角色到底如何定位？或者说，编辑所应担当的社会职责主要是什么？

或有编辑新手率尔而对曰：编辑嘛，就是编书匠啊！

这样的回答，让我不免想到《老子》开篇所说的两句话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就是说，凡是可道可名者，就并非原始或本始意义上的那个恒定不变的“道”与“名”。由此我可以朴拙地演绎一句：对于编辑角色的定位，若果真是三言两语甚或一言半语就“可道”、“可名”的，那也许就一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编辑”了。——一个看似简单浅易的问题却引来不同认识乃至各种论争，说明这个问题本身并不简单，值得提出

来讨论和研究。

为了回答这一问题，请允许我们先简单地回顾、分析一下三十年来有关编辑角色定位和职责认知的历史吧：

曾记得，当年我才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时候，社内的老同志就对我教导说：编辑要做无名英雄，甘为他人做嫁衣裳。多少年来，我们对于编辑工作的认识，一直限定于这样的水平；对于编辑职责的履行，也是这么坚持的。有趣的是，直至我慢慢地熬成老编辑后给新手上课时仍是这么要求的。与此有因果关系的是，既然编辑工作是“为他人做嫁衣裳”，那么论其实质，编辑所从事的业务就只有技术性劳动——“做嫁衣”，不就是“裁缝”嘛！显然，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值得反思的！

另一种说法更加极端：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；依理而推，当然也是编辑的衣食父母。这样一种定位，意味着编辑不仅需要为别人打工（做嫁衣裳），做他人的“孝子”，而且还要靠别人养活，似乎成了作者的“养子”。

长期以来，在那样一个“革命”至上的年代里，在那样一种只讲贡献、不求报酬的左倾思潮影响下，我们的编辑确实长期发挥了甘当革命老黄牛的作用。平心而论，这种编辑角色的定位和编辑职责的提倡，虽有特定的时代性要求和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身需要，比如充分肯定了编辑工作的无私性和崇高性，进而激发了编辑工作者的潜能，但如果仅仅这样定位，无疑又存在着相当的片面性：

首先，编辑工作尽管需要讲究社会政治责任和职业道德，但究其核心，它毕竟是一项以业务为主的工作。既然以业务为主，就并非是只需要精神作用，或者更直接地说，只需要有革命意志和热情就可以了的。

其次，从编辑的业务来看，也并非只有“做嫁衣裳”的技术